

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 及其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阳海燕¹

（长沙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 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参与双方，利用媒介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述，形成了“激进”和“渐进”两种叙述方式。湖南新政失败之后，革命话语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完成了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而渐进叙述则被建构为“保守/落后”的历史形象。戊戌“新旧之争”的革命化建构为近代湖湘文化留下了卓励敢死的谭嗣同精神，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 湖南 戊戌“新旧之争” 历史建构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 K25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10—0084—05

湖南新政运动，亦称湖南维新运动，指 1895 年至 1898 年期间，发生在湖南的现代化导向的社会运动。1895 年秋，谭嗣同与唐才常、欧阳中鹄在浏阳创办算学社，拉开了湖南新政运动的序幕。1898 年三、四月间，随着时务学堂课艺流出校外，引发新政领导阶层的内部争议与分裂，新政陷于停顿，并随戊戌变法发生而失败。争议以“年份”（1898 年为农历戊戌年）名之，称湖南戊戌“新旧之争”；以“起因”（争议起因于时务学堂课艺）名之，称时务学堂“新旧之争”；以“事件”（发生于湖南新政运动期间）名之，称湖南新政“新旧之争”，名异而实同。

既往研究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阐释，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革命史范式和“传统/现代”、“新/旧”的现代化范式中叙述的。但近来学界逐渐抛弃这种过于简化的叙述模式，打捞另一面历史，湖南新政“新旧之争”逐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相。甲午之后，面对豆剖瓜分的民族危机，变法几成共识，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变？变什么？变到什么程度？简言之，其时的湖南士林，新不全新，旧不全旧，都对新政有着一定程度的认同。因此，“新旧之争”有着错综复杂的多重因素，涉及“改革路径”、“意识形态”与“利益分配”等多个层面。湖南新政运动涉及方方面面，湘人都是参与主体。“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中，两派之间的争执并无明显的是非曲直”^[1]。但问题在于，“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新党’、‘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的频繁出现，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2][82]} 本文并不执着于分辨此种新旧分野的是非曲直，而是回到历史原场，着眼于媒介与文化关系角度，探讨湖南新政运动如何通过媒介完成自我的历史叙述，而此种历史叙述又如何影响到湖南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并进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两种叙述方式

湖南新政运动之所以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在于官绅通力合作，在甲午之后全国亟欲变法的氛围下，湖南成为推行新政最为有力的省份。简言之，“维新”与“守旧”并不存在于湖南士绅之间。新政初启之时，湖南士绅几乎都支持新政运作。后来

¹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报刊与近代湖湘文化转型及其认同研究（1897-1919）”（18YJA860018）。

作者简介：阳海燕，1972 年生，女，湖南冷水江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传播学。

被称为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与被称为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之间，维持彼此合作和松散的同盟关系。但当新政继续推进，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宣扬民权观念，推行康有为的激进改革路线，与王先谦、叶德辉等主张推行工商政策，但在制度和文化上固守儒家伦理，“严夷夏之防”的渐进路径产生了严重分歧。双方以时务学堂课艺为焦点，围绕“改什么”、“如何改”、“改到什么程度”进行激烈争辩。在争辩过程中，双方都利用媒介资源，传播己方观点，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新政叙述。

（一）《湘报》与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激进叙述

在湖南新政运动期间，陈宝箴、江标、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湖南官绅，为“开风气，拓见闻”，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创造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围，创办了《湘学新报》《湘报》、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等新式传播机构。办报需定言论宗旨，改革需定指导方针，这皆与康有为改革思想有着密切关联。时务学堂创办之际，湖南士绅聘请康门弟子梁启超为总教习，叶觉迈、韩文举、欧榘甲为中文教习。入湘之前，康有为曾与弟子就改革路径进行商量。“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仁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辞。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3]58} 作为戊戌变法之开风气者和设计师，康有为“营一隅以为天下倡”，以湖南为基础，带动全国变法维新运动。因此，湖南新政运动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湘报》“大约以倡康教为宗旨”^{[4]415}，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及服膺“康学”的谭嗣同、唐才常等湖南士绅，充分利用《湘学新报》《湘报》，以变法图强、救亡御侮为主旨，刊登时务学堂课艺和南学会演讲，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西方自由民权学说，极力宣扬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政治学说和激进化的改革思想。“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际则相策应。”^{[5]62}

（二）《翼教丛编》与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渐进叙述

戊戌时期，康有为激烈狂躁的行事作风和“大变、全变、速变”的改革思想，在维新人士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南学会之演讲，亦不是全为听讲绅士所接受。《湘学新报》《湘报》的过激言论和过于依附和追捧“康学”的行为，陈宝箴父子颇为反感，认为康有为虽才识可用，但其“素王改制”、“民权平等”之说，乃“偏宕之辞”，“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君臣父子之大防”，建议朝廷着令康有为将书自行销毁，以“厘正学术”、“维持风教”^{[6]779-780}，表明双方在改革路径上的分歧。在时务学堂课艺流出之后，康梁等“挟湘人以行康学”，彻底批判和改造儒学，宣扬激进民权改革的改革路线，引发了湘省士绅的激烈反应。他们团结在湘绅耆旧王先谦的旗帜下，严厉驳斥梁启超等康门弟子“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7]12} 要求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将康门弟子驱逐出湘，以免学子“误康为新”。1898年，王先谦弟子苏舆搜集相关文献，编成《翼教丛编》，极力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批驳康有为“六经皆伪”、托古改制的观点，指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8] 为“严身心义利之界，晰古今政学之精，究国家利病之原，探东西艺能之蕴”，王叶等人主张“核名实”“务实学”，划清“西学”与“康学”之间的界限。“方今朝廷言学，中西并采，屡见纶音，吾辈草野寒儒，遵奉宸谟，岂于西学尚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将‘新学书局’一律改为‘西学书局’，以免康学冒托，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7]315} 简言之，王先谦等人不反“西学”，而反“康学”；不反“新政”，而反康梁式的“新政”，其目的是正人心和卫儒道。

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缠杂了地域（广东与湖南）、学派（汉学与宋学）、党争（康党与反康党）、改革路径（渐进与激进）、利益格局（新政意味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趋新者能分享更多机会，而“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等复杂因素。在争议过程中，双方营垒对立，阵线分明，但论战双方多在“党争”意义上理解这场争议，大抵支持康梁的以《湘报》为中心，支持王叶的以《翼教丛编》为中心，利用媒介为己方观点辩护。其时梁启超、谭嗣同奉召进京，与王先谦笔战的是熊希龄，他

并没有将自我拔高到爱国/进步的高度，而是针锋相对，同样要求陈宝箴整顿全省书院，解聘诸如王先谦等死守儒家学说的山长，聘请兼通中西的士绅主持书院教学工作。参与新政的邹代均曾指出，康梁等维新人士“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其奸诡不可不防。”^{[9]2757-2758}从变法维新角度而言，“湖南新政期间，新旧两党之间表现出了深刻的差异，梁启超将启蒙视为救亡的根本途径，而旧党则以发展工商实业、发展国防、改革科举考试作为救亡的根本途径，同时反对启蒙，认为启蒙反而将加重中国之危局。”^[10]简言之，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关键，是对待儒学的不同态度，在其他领域，双方主张有重叠之处。康梁借儒学之“旧瓶”，装入西方政治制度的“新酒”，以民权思想释放改革动力，但如此则可能引发士子信仰危机和秩序动乱；王叶则维护儒学正统地位，主张尊孔翼教，将改革限定在“器物制造”层面，避免对政教制度和思想文化造成冲击。“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贯之，则仍腴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何如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微逐，尚留我本来面目之为愈邪。”^{[11]34}但此种“师夷长技”的器物改革，经过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表明，并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简言之，湖南戊戌“新旧之争”，折射出儒学在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深层困境和“救亡”与“启蒙”之间的深刻冲突。

二、后湖南新政时代媒介对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曾以义和团运动为例，指出历史存在三个层面：作为事件的历史，即史家对历史的描述与解读；作为经历的历史，即历史参与者与特定群体对历史的认识；作为神话的历史，即历史事件的神话化，以借助历史对现实施加影响。新政失败之后，湖南维新士人星散。康梁远走日本，成立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主义。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创办《中国日报》《警钟日报》等报刊，极力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并与康梁展开笔战，推动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新闻的本质是一种隐喻性的修辞活动，修辞主体通过相关话语资源的利用，以隐喻方式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定义，在共享的意义框架中形成对现实世界的特定理解，将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打通、对接并进行整合。“国家记忆、历史情节的叙述说明，不仅仅是对单纯存在的事实、事件的记录和论争，还会包括‘诗意的和修辞的因素’，只有利用这些技巧、手段才会使既存的事实转化为故事的模式”^[12]，实现历史叙述主体和受众之间的想象性沟通关系。在这种媒介化建构中，湖南新政作为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成为各种叙述主体强化自身立场的话语资源，双方曾经的价值共识和维新合作在历史叙述中被刻意遮蔽，“守旧”、“维新”两分法也日趋标签化。“他们通过报刊、书籍等媒介的中介与传播，使得其主张得以为全国郑认识。在双方的政治宣传中，都把‘新’、‘旧’视为一种政治语言。在维新人士的言论中，往往把新作为己方之形象。而站在对立面之一方，则反驳之。在这种论述之中，‘维新’、‘守旧’的形象已经渐渐成形。”^{[13]100}

（一）《戊戌政变记》《清议报》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

1898年，梁启超在逃亡日本后，即撰写《戊戌政变记》一书，意在为变法张目，为改良辩诬。虽有论者质疑梁氏历史叙述的动机、背景及其叙述诉求，但毋庸置疑，该书成为百年来关于戊戌变法及政变的权威叙事。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将变法失败归结为慈禧主政，光绪无权和守旧大臣抵制改革，“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14]69}在“维新/守旧”的历史框架中，展开对湖南新政运动的叙述，并总结其失败之原因。“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鬩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14]70-71}

作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和死难于庚子勤王事件的唐才常，在康梁关于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叙述中占有突出地位。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谭嗣同的《仁学》，刊载谭嗣同的传记，并将之塑造为慷慨就义，为中国变法维新而死的烈士。如对谭嗣同受刑而死作如下叙述：“呜呼！谭浏阳其知之矣。当政变之初起也，有某国人劝以出走者，而浏阳曰：‘各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未有流血，请自谭嗣同始。’迄今诵其遗言，仰其高节，犹令人有怦然欲死心。”^[15]戊戌政变之际，谭嗣同曾与梁启超论及不逃亡的理由：“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

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些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领头人吧。”^{[16]307}梁氏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构建了谭嗣同慷慨壮烈，死于国事的形象。唐才常殉难后，《清议报》亦刊载唐才常传记，颂扬唐才常在湖南新政中的贡献，“陈公在湘兴时务学堂，设保卫局，开南学会，靡不资其参议”，并慨叹唐才常之死，“皇上复辟之机，与吾中国维新之运，将自此绝也。”^[17]康有为亦撰写《唐才常勤王辨》一文，在攻击旧党张之洞的同时，歌颂唐才常“洒涕以救中国，激昂以厉国民”的气节。此外，还有人搜集谭嗣同、唐才常的文章，编为《浏阳二杰集》，号召读者效法先贤。“唐才常以一布衣而能激励忠义，号召万众，思以勤王就上，以救中国，其忠至矣。张之洞狼子野心，背君媚贼，既欲永废皇上，故必大挫帝党，无如康有为主皇上维新，受皇上密诏，出亡海外，尚呼号求救，天下皆知。唐才常之为勤王，亦大众共见，无可加罪，故谬家诬捏，以饰己罪。”^[18]在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中，“新旧之争”被置于忠/奸、爱国/卖国的话语框架中叙述，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二）《警钟日报》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

革命党人在与康梁等人的笔战中，为宣传革命思想，亦借助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叙述，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舆论支持。20世纪初，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留日学生成为反满革命主体，革命党人将时务学堂作为湖南新式学堂之嚆矢，以为学潮张本。湖南新政之时，“梁氏方昌言保国，虽其学课时时属入康有为之私说，而其学堂之有精神，则为近今所仅见。学生之成立者，则汉口死事之李炳寰、田邦璜、林圭，湖南死事之蔡钟浩、唐才中皆是。湖南维新至戊戌三四月间而极盛，而诸顽固之出而倾轧，全体新政之败坏亦始于此时……时梁氏早去，熊氏之流皆革职，而俞廉三组织一切，倚王先谦、孔宪教为声援。而时务学堂堕地，遂有求实书院之易名矣。”^{[19]494-495}简言之，革命党人亦把湖南新政作为革命的源头，将革命作为谭嗣同、唐才常未竟事业的继续，以强化革命事业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湖南新政失败归咎于“顽固党以排挤新学，倾陷志士为目的，戊戌、庚子之变，皆彼党构成之。”^[20]王先谦等旧党人士“奸险狠厉，握湘省用人，行政全权，厚养死士，其心叵测，人称为土皇帝。”^[21]进而言之，革命是体制外的暴力运动，在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叙述中，有着更为激进的诉求。“湖南新旧党争之争论，至戊戌间而已极。谭嗣同、唐才常之流，初欲以文字改良社会，规模初立，而王先谦、孔宪教诸劣徒，大肆排沮，而湖南之局败裂，此葑（指沈葑一引者注）实亲见之。盖葑素不喜善文字，其持破坏主义出于性成……戊戌春夏之交，湘中治绩之表面，非无可观，自葑视之，则以为颡颥而无用。”^{[22]287}倡天下风气的湖南新政运动在革命党人看来，“颡颥而无用”，因为革命党人有着比改良主义更为高远的政治目标和更为激进的实现手段。

（三）《觉迷要录》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

与康梁一样，王先谦、叶德辉应对舆论攻击的方法，也是搜集文献，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论述。在继续重印《翼教丛编》的同时，1901年，唐才常庚子勤王事件后一年，叶德辉继《翼教丛编》之后，着手编著《觉迷要录》。该书仿效雍正所编之《大义觉迷录》，将内容分为四编，卷一为查拿康梁，惩办自立军的谕折、告示、中外议论、报章新闻等；卷二为自立军事件之奏折；卷三为批驳“康学”之言论与文章；卷四为康梁等人的书札、演说、时务学堂之课艺。1905年，《觉迷要录》刊行。《觉迷要录》称康梁等为“无赖”、“逆党”、“叛匪”，严厉批评“康梁学术陷弱人心”，虽托名“维新”，实陷害中国，而年轻士子受害尤甚。读者如果阅读《觉迷要录》，则可“知逆党一切语言文字，皆不足以假托维新，藉名皇国。因此身膺黜黜，以快人心，则谓是编为康梁逆案之定讞，不亦可乎。”^{[23]2}在叶氏看来，“惟有将新、旧、顺、逆四字，剖析明白，使士林咸晓然于逆党之所为，无所谓义，亦无所谓侠，则病根可以划除，而后士习可返于淳朴也。”简言之，只有将“新旧之争”从“忠/奸”二分的话语框架下解放出来，对康梁学说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摧陷廓清，使人心重返正途。

三、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对近代湖南知识分子的影响

历史惟有通过话语叙述，才能构建为历史记忆，并在不同时刻被唤醒和激活，成为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观念。在“崇新”、“趋新”的时代风气之下，湖南知识分子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构建关于湖南新政运动的历史叙述。1906年，湖南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陈家鼎以“铁郎”为笔名，在湖南留日学生所办刊物《洞庭波》上刊文，对“新旧之争”双方都进行了批评。在陈

家鼎看来，谭嗣同、唐才常受康梁愚弄，湖南新政运动只是造就了康梁等保皇党和立宪党人，中国今日之祸，湖南难辞其咎。

“湖南时务学堂者，梁氏功名之发轫地也。南学会者，保皇党同志之总机关也。前无所谓保皇党，保皇党者，戊戌政变后之名词也。是故无湖南，断不能有保皇党也，无保皇党，断不能有立宪派也。去岁湘人开悼谭唐会于东京，各省多反对之者，夫亦见今日立宪之祸，湖南人有不能逃其咎者欤。”^[24]而对于守旧派，陈家鼎也进行了严厉批评：“王先谦者，湖南优界之管理员也，而孔宪教、叶德辉等受其驱使，互相朋比，日以斥新学、排正党为能事。”^[24]陈家鼎认为，湘人要悔过图新，既不追随康梁，也不推崇王叶，而是要投身革命，成为首倡起义之省。杨毓麟认为，湖南党争起于新政期间，并批评王先谦、叶德辉为了“争权”，败坏维新大业：“戊戌以前，湖南无所谓新旧党之名；有之，自劣绅争权、学堂交哄始。为祸首者，实为王先谦、叶德辉。交讦互讼，见于《翼教丛编》及《湘报》中者，海内人士皆耳而目之。王、叶二氏之无行，此吾湖南人之所共知也。”^[25]⁴⁸陈天华亦在“新/旧”“进步/落后”的阐释框架中叙述湖南新政：“湖南之有日报也，自戊戌维新始也，熊秉三（指熊希龄一引者注）为干事，为民留学浏阳二杰（谭嗣同与唐才常一引者注），有南学会、时务学堂以为机关，一时议论风发，举国若狂……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种种顽绅之猥缩而不敢出，听志士之若何改革者，皆此报之力。此报既风行湖南，全省之人皆震动，学堂、演说会、不缠足会等到处响应。”^[26]⁷

简言之，湖南知识分子对湖南新政运动的历史叙述，与康梁一样，同样在“新/旧”、“忠/奸”的框架中展开，并将谭嗣同、唐才常视为中国革命的精神源头，追孰先贤，投身革命，成为湖南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如黄兴所说：“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由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27]⁶⁷康梁改良立宪、存满保皇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提供政治空间，但随着历史发展，湖南知识分子日渐意识到，满清朝廷作为异族政权，已然“不可恃”，在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三种历史叙述——守旧论述、维新论述和革命论述——中，其认同日益革命化和道德化。湖南戊戌新旧党争，旨在为个人牟利，造成湖南士林“党仇交织，戈矛林立”的局面。惟有以民族和国家为目的，不为“党派之奴”，投身排满革命，方能存湖南，救中国。“苟有不必排满而得存湖南者，吾辈不必排满可也；苟有其不必出于排满而必不得存湖南者，吾辈又奚为隐忍苟活坐视其亡也？”^[25]⁴⁹⁻⁵⁰而曾经引领风气的康梁，已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和革命对象：“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27]¹⁶

湖南新政运动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在湖南近代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晚清戊戌变法运动的缩影，湖南作为戊戌运动中最富生气的省份，维新运动由理念落实为具体行动，赋予了戊戌变法以社会实践的真正意义，也是湖南现代化运动的真正开端。新政期间，湖南创办了最早的一批现代企业和学堂、报刊、学会等新式文化机构，近代西方文明第一次成规模地传入湖南，对湖南士人心理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冲击。“湖南人的近代风气的发生，实肇始于戊戌维新运动。因此，湖南维新运动的首要意义，便是开放了湖南的风气，是湖南人受到了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的洗礼。”^[28]²²⁶

包括湖南新政运动在内的戊戌变法，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但在梁启超的“线性史观”之下，戊戌变法取得了辉煌成功：“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折一无所存。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力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而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29]⁶³线性史观为历史预设一目的，将历史事件整理成通达历史目的的因果链条，时间就成了逻辑，无限丰富的历史被剪裁为正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线性史观下的湖南戊戌“新旧之争”，“守旧”为“维新”之反动力，而“维新”又为“革命”之反动力，如此“反反相衔，动动不已”，直达历史目标之实现。在这种政治修辞策略中，在历史真实和政治目的彼此混杂的媒介叙述中，“新旧之争”被固化为“新/旧”、“忠/奸”、“进步/落后”的标签，以建构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论述。因此，湖南新政运动“新旧之争”的媒介建构，给近代湖湘文化留下的“最正面、最契合历史大势的遗产，其实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和卓励敢死的谭嗣同形象^[28]¹⁵¹。如上述沈荇、陈家鼎、杨毓麟、陈天华、黄兴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叙述，都能看出革命话语和谭嗣同精神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 [1]朱至刚: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J].学林,2013(3):149-156.
- [2]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M].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4]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A].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汪叔子,张求会.陈宝箴集·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7]苏舆.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8]曹立前.苏舆与《翼教丛编》[J].历史教学,1996(2):56.
- [9]邹代钧.邹代钧函[A].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 [10]曹润青.启蒙与救亡之争:从《翼教丛编》看湖南新旧两党的论争[J].晋阳学刊,2017(5):133-138
- [11]王先谦.复毕永年[A].王先谦.虚受堂书札[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 [12]丁云亮.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J].学术界,2018(4):110-120.
- [13]罗皓星.湖南新政(1895-1898)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论述之形成[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A].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5]梁启超.谭嗣同传[J].清议报,1899(4):4-7.
- [16]梁启勋.谭嗣同和梁启超诀别[A].谭嗣同研究资料汇编[C].1988.
- [17]后死人拟稿.来稿杂文:义士唐才常传[J].清议报,1900(58):14-15.
- [18]光绪帝党人来稿.来稿杂文: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J].清议报,1901(72):11-12.
- [19]学风:湖南学界之风云[A].罗家伦.国民日报汇编·第2册[C].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
- [20]地方新闻:新劣党争执之一斑[N].警钟日报,1905-01-15(4).
- [21]附录:湖南顽固党之批评表[N].警钟日报,1905-01-15(4).

-
- [22]黄中黄. 沈荇[A]. 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 • 第 1 册[C].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
- [23]叶德辉. 觉迷要录[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7.
- [24]铁郎. 二十世纪之湖南[J]. 洞庭波, 1906(1):3-5.
- [25]饶怀民. 杨毓麟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26]刘晴波, 彭国兴. 陈天华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 [27]羽戈. 激进之踵: 戊戌变法反思录[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
- [28]林增平, 范忠程: 湖南近现代史[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29]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A]. 饮冰室合集 • 第 1 册 • 文集之六[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